

“知识精英”的处境与“返乡体”的爆红

■孔德继

摘要:在过往的三个春节假期期间,知识分子的返乡题材文章风靡移动互联网。这些返乡主题的文章先后经历了“爆转”、“饱受争议”和“遇冷”的“过山车式”传播过程。一度爆红并被戏称为“返乡体”的部分返乡话题文章存在闭门创作、立场先行、将乡村问题化和缺乏历史感等问题。将“返乡体”置于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从知识分子处境转变的角度探讨“返乡体”文章的生成逻辑是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返乡体”的作者们非议乡邻的致富手段、道德问题和对文化教育的漠视,恐是地位日益边缘化的返乡知识分子的自尊维持手段。近年来的社会阶层固化加速,通过知识和学历改变命运越来越难,恰是返乡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和重要的社会背景,它既型塑着乡村,也催生了被边缘化的返乡知识精英们的写作实践。“返乡体”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反观自己,没有在社会变迁的结构背景下理解乡村。“返乡体”的爆红并非因其对现实问题的客观反映,而是与社会矛盾加剧、移动互联网时代传播模式的转变,以及社会情绪缺乏宣泄出口的多重因素有关。

关键词:返乡体;农村教育;阶层固化;农村;问题化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8)1-0024-11

作者简介:孔德继,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以宗教、民族、土地、城市化和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经验研究(北京 100094)。

自鲁迅的小说《故乡》、《社戏》等返乡名篇起,类似的知识分子对家乡的写作就从未中断过。而且由于受众广泛,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甚至是该题材的常态。2003年,陈桂棣、吴春桃夫妇基于在安徽的长期调研,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在《当代》刊发后又成书出版,并于2004年获颁尤利西斯文学奖。转年,夫妇二人还因此上榜了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度亚洲英雄人物。2010年出版的梁鸿著《中国在梁庄》和2011年出版的熊培云著《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都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和大众媒体领域的赞誉。2010年,《中国在梁庄》获人民文学奖,“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书”、“新京报

2010年度文学类好书”、“《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荣誉称号。2013年,梁鸿凭借《出梁庄记》再夺“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散文家”称号。

2015年春节期间,互联网媒体“澎湃新闻”的“市政厅”栏目刊发了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文,引起较大反响,各网络平台的总点击量足有几百万之多;2016年春节前后“返乡手记”再度流行,返乡文章的阅读量之大、返乡话题讨论参与者之众都超越了2015年;2017年的返乡文章则更趋理性,无论是文稿量还是公众关注度,都没有再现前两年的火爆场面。

对近几年“返乡体”流行的现象解释之一是认为这些文章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与此同时,返乡文章的负面叙事也引发较大争议,如拙作《泛滥的返乡体折射知识分子阶层失衡》(孔德继,2017)最早将“返乡体”文章和“返乡体”作者作为讨论对象,返乡作者们变成了他们老乡一样的评论客体。类似表达了对“返乡体”质疑的文章并非孤例,且文风直白,如《文科博士们,春节回家能不能别装?》(刘清泰,2017),《文科博士,春节返乡书写能否避免煽情》(郭郭,2017)等。

本文无意讨论具体的乡村问题,也不想研究所有知识分子以家乡为写作对象的作品,而是聚焦于“返乡体”爆红这一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鉴于被爆转的返乡题材文章主要集中于2015年和2016年的春天,所以本文以这两年总点击量(估算)达50万次以上的典型文章作为核心分析样本,其他文章作为辅助分析样本,在精读重点文章的基础上,基于返乡作者的知识精英身份和阶层流动的社会背景,从互动论和建构论角度重新审视“返乡体”创作逻辑和内容的客观性。

一、“返乡体”的概念界定

本文要讨论的“返乡体”特指春节期间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准知识分子以较强的知识和道德优越感,在春节假日期间返乡记录村庄、并在公开媒体平台上发表,从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的中短篇纪实文章。“返乡体”与其说是一个文类,不如说更接近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想型”(ideal type)。从这一角度来看,并非所有的返乡类文章都具备上述所有特点,很多心态平和的返乡文章,对“返乡体”的反转描写与辩论,以及没有实现被爆转的文章,都不算本文所特别指称的“返乡体”,但仍可统称为“返乡文章”。

经过搜集和甄别,作为核心分析样本的文章如下:

表1 被部分爆转返乡题材文章表

作者名	作者身份	文章标题	首发平台	上线时间
王磊光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生	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	澎湃新闻	2015年春
王君柏	江南大学法学院社会心理学副教授	失落的乡村:一位大学教授乡村笔记	不详	2015年9月17日
杨仁旺	人大附中西山学校教师,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大才子: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	《中国青年报》	2016年02月19日
黄灯	广东金融学院教授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十月》杂志	2016年1月27日
高胜科	《财经》记者	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	《财经》杂志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	2016年2月14日

注:文章来源见参考文献部分。

二、“返乡体”的结构特征

(一)将乡村“问题化”的写作倾向

在文章内容上,获得广泛传播的返乡文章多以呈现乡村问题为主,话题涵盖教育、秩序、伦理、养老、人气等方面。其中,教育问题堪忧,“良风美俗不再”和“拜金主义”是“返乡体”文章普遍关注的几大方面。

对农村的问题化叙事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时期,教育家晏阳初博士曾将农村人定性为四个特点——“愚、穷、弱、私”,并试图加以改造。在对20世纪20年代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的10年回顾中,晏阳初(晏阳初、赛珍珠,2003:66)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还有,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也就牵连到具体的

“人”的问题。因了文化失调的高度而崩陷社会结构于纷崩,因了池湖积水的污浊和湍乱,而益萎竭了鱼的生命。中国人——尤其是大多数的农民——的衰老、腐朽、钝滞、麻木和种种的退化现象,更叫中国整个社会的问题严重到不可收拾。

表2 被爆返乡文章的“问题呈现”

作者	文章标题	呈现问题
王磊光	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	留守人群、打工人群、教育问题、婚姻问题、医疗问题、体制问题、干群问题、非正常死亡、乡土文化的衰败、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城乡关系
王君柏	失落的乡村:一位大学教授乡村笔记	星散的人口;即将荒芜的土地;日渐凋零的老一辈;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良风美俗的损蚀;现代化苦果
黄灯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代际的贫穷轮回
高胜科	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	普遍性虐待老人、农妇组团“约炮”、劝孩子辍学、拜金、攀比、享乐、礼崩乐坏
杨仁旺	北大才子: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	礼俗秩序崩塌、拜金之风日盛、暴戾之气横行、乡村教育凋敝

读过晏阳初这段话的不难感受到,在将农村看做“社会病理学”对象这一点上,如今的返乡精英与晏阳初非常相似。面对当年乡村建设这股将乡村病化的思潮,费孝通很早就发现和指出了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针对类似思潮进行了多次批判,这些批判既有价值层面的,也有方法论层面的。在价值层面,1948年8月费孝通(1999b)在《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一文中指出,晏阳初是以传教精神去了解教育的,这种“传教精神”就是先假定了自己的“是”,然后去教育别人的“不是”:

传教就是“以正克邪”,被传的对象在没有皈依宗教之前,或者说没有弃邪归正之前,满身都是罪恶。所以晏先生先得认定了“愚贫弱私”的罪恶,然后可以着手“教育”;以知识去愚,以生产去贫,以卫

生去弱,以组织去私。

1933年11月15日,费孝通(1999a:123-132)在《社会变迁研究中的都市和乡村》一文中就指向了“乡建派”的方法:

目前中国,在社会研究上,最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农民对于乡村运动所抱的态度是怎样的。我们只看见要知识分子下乡去的宣传,要改革这样要改革那样的呼声,但是我们绝没有机会听见一个调查农民态度的忠实报告。好像邹平、定县已在乡村中引入了种种新的生活形式,我们很愿意知道这辈在改变生活形式中的农民对于这些新形式的认识是怎样的,在态度上我们才能预测这种乡村运动的前途。

费氏对“乡建派”方法的批评,用今天人类学的术语就是缺乏主位的声音。就上述两点,“返乡体”作者们显然重复了前人的问题,而且在思想上、研究态度上以及实践上,则都比前人差得多。

笔者曾因撰文(孔德继,2017)指出过“返乡体”的问题化倾向,并由此引发过读者和同行们的责问。他们在与笔者聊天或以文下留言的方式提出质疑:

难道“返乡体”提到的问题现实中都不存在吗?

不让返乡作者们说话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吗?

对此类问题,赵旭东(2008)早有回应,现摘录如下:

我们不否认,晏阳初提出的“愚、穷、弱、私”这四种病症在某些农民身上有所显露,但绝不是在每个农民身上都会生发这类实质性的“疾患”。可是,这种界定却成为一种“话语”在影响着没有去过乡村、对乡村人的生活并不了解的城市人的思维;他们大多都会相信这样的界定……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农民以及他们的生活,在这些作家的书写中常常成为一种可被界定的因而是被刻板化的对象。这些作家认为在乡村那里,人们的生活是散漫、混乱、缺乏凝聚力甚至是极度苦难的,并由此祈求国家以及外力的帮助来改变他们所描述的那些“不堪”的状况。

“返乡体”把在乡村发现的问题“乡村化”，不管这些问题在历史上是不是常态、在城市里是不是更甚，统统锁定为乡村问题。农村固然有很多不良现象，但并不意味这些仅仅是“乡村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老年人时常遭受诈骗的问题，这类问题农村虽有，但非农村独有，有些问题的严重性在城市里还甚于农村。早在一百年前，乡村经济已经从封闭的自给自足体系变成了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如今乡村和城市、乡村与国家政策的关系更加紧密，“农村问题”更可能是在整体社会结构背景下城乡共有的问题在农村的呈现。

本文重提费老对民国“乡建派”的批评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将乡村作为社会病理学对象的意识形态从未离我们远去。2016年2月16日凤凰网评论频道刊发了其“公民返乡”的系列评论，其中一篇为评论频道主编高明勇的作品《作为公民，提着笔杆子还乡》，该文主张把公民提着笔杆子返乡“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仅仅是春节期间的固定节目”：

笔之所及，心之所系，不仅仅是农村，更是城镇化背景下的生存环境，更高层面来看，无关城乡，关乎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权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发现问题，挖掘问题，呈现问题，从而为改善、为转型，唤醒治理的注意，唤醒内心的关注。

该主编把拿着笔杆子进村的人预设为“公民”，试问，“公民”返乡，乡下的人是谁？类似轻易将农民排除在公民群体之外的问题，在邓正来(1997:6-7)界定中国市民社会的概念时就出现过：

中国市民社会是由独立自主的个人、群体、社团和利益集团构成的，其间不包括履行政府职能、具有“国家政治人”身份的公职人员、执政党组织、军人和警察，也不包括自给自足、完全依附于土地的纯粹农民。

赵旭东(1999)专门撰文批评过邓正来的“市民社会”说：

邓正来先生在一系列的所谓“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中，为着要在中国的文化场域中重构一种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理论体系，他有意无意

地将中国的农村和生活在那里的农民，排除在他所界定的中国市民社会的场域之外。在他的这种界定中，其所隐含的一种可能的文化霸权就是，占中国总人口85%以上的农民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场域并非是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基础，而恰恰是知识分子或经济上的精英所占据的城市这样的场域才是市民社会建构所要依赖的，而这样的逻辑岂不与市民社会深层的“大众社会”的意义形了解释上的悖论吗？

乡村被问题化，除了证明“返乡体”缺乏整体观，他们其实还缺乏历史感。比如对彩礼高的问题，返乡作者们将其解释为“拜金之风”。我们不必否认彩礼高的现象存在，但对彩礼高的解释，还原到历史和社会背景中理解，恐怕更能切中问题实质。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几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B超和人工流产的泛滥，造成了社会上悬殊的性别比。世界上正常的性别比通常在107以内。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杨菊华,2006),2000年全国所有胎次的性别比为119.9,农村平均为121.7;一胎、二胎和二胎的性别比分别为107.1、151.9和160.3。分省性别比,一胎最高的为江西省,达138.0;二胎最高的为湖北省,达206.0;三胎最高的为安徽省,达257.6。根据六普的数据(石人炳,2013),2010年,除了新疆和上海海外,其余各省市区的第一孩出生性别比均高于107,湖南、甘肃、河南、海南、吉林、黑龙江、湖北的第一孩出生性别比都超过115。其中,广东省的第一孩出生性别比最高,达到122.30。男性过多导致家庭条件处于劣势的适婚男青年无力娶妻;另外,“天价彩礼”现象也并非新生事物,如果按彩礼与人均年收入之比对照,目前几十万元的彩礼未必比三四十年前的50后、60后那一代人结婚时的成本更高。只不过这些彩礼让很多外出就读的大龄适婚青年因为囊中羞涩而倍感压力。

返乡者们还乐于谈论村庄的凋敝和村庄失序,如因外出务工引发的留守问题。谈到农民工,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兴起的

现象,村庄的“空心化”和“社会失序”伴随其后发生。但事实上,“空心村”现象的发生远比我们想象得要早。清朝道光十五年(1835年)云南大理源县凤羽乡“铁甲场”村立了一块乡约碑(段金录、张锡禄,2000:537-538),记录了一个治理“留守妇女”问题的故事。这个故事最初由王铭铭(2006)介绍到学界:

当时铁甲场村的男人们常年外出打工,留在家中的妇女则“屡行不义”,有的擅自砍伐种在河边用来防御水灾的柳茨,有的将没有成材的树木连根拔取,有的翻墙偷盗邻居的家禽和蔬菜。村姑们犯错被发现后,不但不认错还以寻死闹场。于是1835年趁多数男子归家之机,村里召集了一次大会,最终议定了八条乡规治理留守妇女的问题,并立碑颁行。

该案例告诉我们,让“返乡体”作者们惊诧的“留守”问题古已有之,传统的农村遇到“问题”能开会立约,颇有治理能力。而且古人的行为还很符合如今“现代性”的标准,比如重视环保,乡约规定发生偷盗,罚银两两三两,而“不环保”的滥砍伐柳树的行为,则要罚银五两。

(二)立场先行的农村教育评价

几乎所有“返乡体”文章都谈到了教育问题。王君柏谈到了留守儿童的辍学;黄灯谈到了乡村与城市教育环境的差距;最夸张的故事来自《财经》记者高胜科的文章,在他的作品中将自己描述成了一个“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凭一己之力打拼,在北京工作、安家,成为榜样,从而一度扭转了村里盛行的“读书无用论”。如今遗憾于颇具功利性的村民因读大学回报率低,重又劝孩子辍学的现象。他杜撰了“一名在读大学生,被父母劝导准备中断学业,要么回家,或者选择留城务工”的故事(李铮等,2016)。

前文回顾了费孝通评价晏阳初预设了自己的“是”以及“农民”的“不是”。接下来的问题是,“返乡体”多大程度反映了现实,反映现实的部分是否算“返乡体”的价值所在?如果我们以教育问题为

例审读这些文本,“返乡体”的叙述不仅值得商榷,而且客观性值得怀疑。

在农村教育存在严重问题这一点上,“返乡体”作者们几乎形成了“共识”,否定和批评老乡们教育态度的立场比较一致。如“北大才子”杨仁旺指出撤点并校政策将各个村小“取缔殆尽”,“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的教育生态,村里的琅琅读书声不在了,精神指引消失了,“文化血脉中断了”。众所周知,能够让文化血脉中断的,除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浩劫和特别的革命运动之外,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几十年来农村教育虽不尽理想,至少也该算得失参半。

王磊光谈到农村家庭供孩子上大学负担重问题时提到:

二十多年来,农村税费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够交税……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

如果“返乡体”作者们说寒门学子通过上大学难以改变命运,实现阶层上升,在一二线城市买房立足越来越难,人们恐怕是不反对的。但要说绝大多数没有希望收回成本,明显是站不住脚的。1998年10月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成立;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发[2000]7号),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正式启动;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2006年取消农业税的设想提前实现。王磊光说农村税费多如牛毛,恰恰与近20年的历史不符。“返乡体”所指的农村孩子肯定不是读贵族学校、花重金出国的那种,所以即便上到大学毕业,教育成本也比较有限。另外,农村孩子大学毕业后收回成本的日子还长,至少在近20年来,不少行业的收入增加幅度并不低。

逻辑不通也是“返乡体”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杨仁旺一会儿把“唯金钱论的价值观”当做孩子们不好好读书的原因之一,一会儿又把“拜金之风日盛”当做“以人为本的教育极度缺失”后果,陷入循环论

证。

“返乡体”指出的教育问题,如留守孩子的健康成长和教育督促问题,固然反映了部分现实情况,但指责家长轻视教育、考虑教育回报低,从而不希望孩子继续上学,这样的判断明显不符合常理,通过文献回顾和实地调研不难证伪。试举两例以供讨论:

笔者2012年曾在河南中部某县调研,发现当地很多村庄的小学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每个班只有四五个男生,女生居多。原因是计划生育年代的男孩作为“独苗”更被特别重视,很多被送到私立中学或县城更高级的学校上学,女孩虽被轻视,但也普遍坚持上学。城市里的学校严重超员,教室里挤满了来自各县借读的学生。

在梁鸿教授近年的非虚构作品《出梁庄记》中,即能找到农村家长特别重视孩子教育的故事:

靠电动三轮车运输外出西安谋生的群体,在外就学的儿子是车夫万立的骄傲和拼搏动力,万立的顺口溜是这样的:“万立西安二十年,蹬起三轮来挣钱,大街小巷都转遍,城里马路弄不转,人人都说我迷瞪,一心挣钱供学生。”(梁鸿,2013:19)

为了孩子上大学,万立两口子于2005年不远万里趁三轮车业务淡季奔赴新疆种哈密瓜,2006年又去克拉玛依,可惜没赚到多少钱。用万立的话讲,是“为娃上学,俺们奔波的地方多得很”。(梁鸿,2013:26)

2008年圣诞节前,万立回儿子的问候短信:“佳节美景无心游,披星戴月健康路,挣钱为儿完学业,是为父的大任务。”(梁鸿,2013:29-30)

综上,“返乡体”作者们指责的“唯金钱论的价值观”,轻易地就可以被更广泛人群的经验所证伪。相比一般的非虚构类写作,“返乡体”的论述呈现出评论多、描述少的特征,具体到教育类话题,没有教学环境、班级规模、学生性别比例等的描述,几乎没有学生、辍学者和孩子家长的声音。乡村教育的问题究竟是不读书,还是没书读,看完“返乡体”可能令人更糊涂。

在“返乡体”对乡村问题的论述中,对诸问题的成因多指向了“人”:不重视教育的人、拜金主义的人、非法致富的人、不孝顺的人、徇私枉法的人、违反礼俗的人。这些人恐怕是不经意间用收入多少等“庸俗问题”冒犯了作者的人,同时,这些人也还可以成为对维持返乡知识分子的自尊有用的人。“返乡体”作者们通过批评这些人的道德问题,批评这些人对文化教育的尊重、不重视,作者的文化资本方能凸显其价值。后文还会分析:返乡手记的生成和风格的定型与知识分子的地位下降和心态失衡有关,没有被夹道欢迎的返乡知识分子需要“返乡手记”这一手段表达以维持自尊。认识到这点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除了指责乡亲,“返乡体”作者们鲜有对乡村问题深刻和客观的分析。

三、作者处境与“返乡体”的生产

返乡知识分子无论在城里就学还是工作,大多是终将离开家乡生活的人。因为“人在别处”,返乡知识分子与家乡人得以区分,并由此形成了返乡作者与家乡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返乡体”作者经常在文中强调对家乡和家乡人的感情,陈述与家乡、家乡人的关系。这些情感表达无疑是作者心态的反映,只不过真实的心态未必与字面表达一致,对这些话语进行类似于深描式的分析,对把握文章的基调和性质是至关重要的。

(一)主位缺失:“闭门造车”作为方法

前边提到过,“返乡体”缺乏与讨论主题相应的细节描写,严重缺乏来自家乡当地人主位的声音。比如,没有“不当致富者”对致富经验和道德感的表述,也没有教育从业者和孩子家长对教育问题的论说。这其实和返乡作者们的观察方式有关,这一点在返乡作品的原文中即有不少体现,“足不出户”做观察是“返乡体”的主流生成方式。

王磊光在文章中提到他过年回家基本不出门,“一大半时间是呆(待)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写东西”,回家其实没看什么。其他博士生群体回家也

很难融入村子的生活,过年回家迟来早走;江南大学王君柏副教授文中也提到,他2015年夏天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那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

除了上述两文有明确的作者留守家中观察家乡线索外,其他几篇“返乡体”文章通过推理也可辨认具有类似特点。杨仁旺的作品议论多于叙述,故事细节相对丰富和可靠的部分主要是围绕其“亲弟弟差点被隔壁的族亲活活打死”这一“家事”展开的;高胜科的文章最终被揭发为打着非虚构的名义的虚构作品,作者没有回老家调查采访;黄灯文章中的故事虽相对充实,但故事以自己的家庭成员展开,看上去并不需要外出调查。而且该文发表在文学刊物《十月》上,是否虚构的性质也未见交代。

老乡们变得更轻视教育和不尊重知识了?难以明辨是非,不再通达事理了?比以前更虚荣了?大家致富都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实现的?良风美俗都没有了?如果乡村真的凋敝了,那又是为什么?返乡作者们如果带着这些问题出门和老乡们聊一聊,即便获取的答案不全面不客观,但一定会有不同角度的说法和更丰满的故事,可惜绝大多数“返乡体”作者们并没有迈开他们调查的步子。返乡文章作者们基本没有走出家门做调查,并且对批评对象怀有不满情绪,甚至没有给这些群体辩驳的机会。了解了这样的写作过程和方式,就更容易理解“返乡体”文本质量低下的原因所在。

(二)精英身份与“乡村关怀”的道义性确认

“返乡体”的作者总体呈现半专业化的特点。作者们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身份虽与调查和写作相关,但不是相关领域的对口专家。“博士生”、“北大才子”、知名记者、高校教师等半专家身份,虽难以让学界专家买账,但足以让文章在传播上有一定噱头。前文已述,“返乡体”文章内容基本是批评和指责家乡的。但似乎因为他们

都是从家乡走出的,与家乡尤其亲人有密切关系,这增强了这些知识分子评议家乡的正当性。只要摆出“关怀”家乡的立场,即便他们的批评不够客观也容易“免责”。

把握作者与村庄人的关系也是理解文本的关键环节。“返乡体”的特色之一是“返乡精英”常在文章中袒露他们对家乡的感情。前无界新闻记者张小马发表了标题耸动的《情欲勃发的乡村》一文。作者在讲述了网聊“约炮”、草率结婚、普遍离婚,以及“网上出轨”后,话锋突变:

食色,性也——这里并没有道德评价和指责——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不管已婚还是未婚,滚滚红尘男女浮沉。

然后又继续讲述“家乡四处弥漫着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出轨”故事。“大尺度的描写”并不妨碍作者将自己勾勒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责任感的关心下一代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在“热衷情色话题的记者”和“道德家”两个身份之间娴熟转换。

家乡的留守儿童早已俯拾皆是,甚至他们也有了二代。这些年来,不少孩子又沦为单亲家庭的留守儿童。相对那些备受溺爱的同龄人,他们自父母离婚之日起,便长期活在两个新家庭的缝隙之中。关于这些孩子的未来,我无法预见,唯有衷心祝福。

高胜科在慨叹“田园故乡不止是在生病,而是有关于忠孝道义的一切伦理气息彻底死去了”之后,也深情表达了对故乡和族人情感:

这是装满了我童年记忆的东北故乡,尽管家人早已搬迁,但我还是每年都回到这里,光顾老宅,在年节中拜访族中长辈老人,并对死去的亡灵焚纸烧香尽一点绵薄的传统孝心。也可以说,多年来,故乡从未离开过我的视野,并因为爱它,才为它的人情嬗变而心疼,为生活在这里的村人遗憾而痛心。这一切的爱与痛之中,自己无能为力,仅能摘录其中的片段,并筹划着有朝一日立此存照,记录民风遽变、家族由盛转衰,以及一个村庄的死亡全程。

“写作是为了家乡好”的创作动机,很多返乡者都有所表达。如黄灯在文章中提道:“本文中,我愿

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通过这种对故乡情怀的强调,“返乡体”对家乡的“污名化”似乎更具正当性。正因为表态很可能源于这种正当性需求,作者们关怀家乡、道德感很强的自我人物设置略显生硬。

(三)物质尴尬与“伪精英”处境

按传统的阶层划分习惯,知识分子职业上接近中产阶级,但无论是在中国的城市还是农村,如今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都日益边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返乡作者们急需一个精英身份来确认他们指点家乡问题与发展的资格,“返乡体”文章本身的内容也不断确认着作者们的尴尬处境。

困扰返乡知识分子们的首先是经济问题,这种酸楚很可能是返乡者们悲情的重要源头。让王磊光博士们困惑的首先是工资问题:

最近一个博士师兄请吃饭,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觉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过年他都回去得很迟,来学校很早。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出现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问,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能拿多高的工资?”所以,他过年回家,基本不出门。这个体验跟我是一样的。

当不自信的博士生王磊光在“群”里面聊天时,发现初中就出去打工的同学混得比自己好,而听到同学们对物质生活的交流时,单一化地理解为“炫耀”: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博士生们对这种“炫耀”是敏感和在意的,文中提到很多同学也因此多年不回家,证明这是一个群体性问题: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

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

对农村教育的批评连带着的是对农村人观念的批判。批判中返乡作者们屡屡表达对“拜金主义”的厌恶,对经济规则成为生活交往重要形式的抗议。“返乡体”文章透露出的信息显示,对乡村教育现状和拜金主义的批判与返乡知识分子的经济处境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

与王磊光一样,“北大才子”杨仁旺回到老家和亲友见面被问起最多的问题也是“你的工资是多少”,这本来是中国人的习惯,但杨仁旺对老乡提问偏好的理解也颇不善意:

金钱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重要标尺,当然如果你是公务员,还会格外受到青睐,官本位观念在乡村依旧根深蒂固。如果说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而非法治社会,这一特点在乡村表现得尤为明显,拥有金钱或者权力就能让你成为口口相传的典范,在酒桌上成为座上宾,掌握核心话语权。至于获取金钱或权力的路径是否合法,往往不被过多在意,因此权钱交易、传销、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成功的“捷径”便不断侵蚀着乡村社会,撩拨着村民们日益膨胀的金钱欲望。

并不完全的悲剧的是,杨仁旺等在城里打拼多年终于在城里买了房子:

明年过年我要在北京搬新家,又无法回老家过年了。当上房奴后,面对家乡的剧变和亲人的处境,我也备感无奈与无力,除了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我就只能用文字记录下这一时代剧变之下的种种乡村图景了。不知下次再回故乡,吾乡之面貌会变成什么模样……(杨仁旺,2016)

房主是新城市人的标志,阶段性成就。和杨仁旺一样,黄灯和高胜科等通过传达他们在大城市买房的喜讯,确认了“精英”的角色。杨仁旺在文末表

示:

明年过年我要在北京搬新家,又无法回老家过年了。当上房奴后,面对家乡的剧变和亲人的处境,我也倍感无奈与无力,除了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之外,我就只能用文字记录下这一时代剧变之下的种种乡村图景了。

因“房奴”身份不能回乡,这又再次确认了这些“返乡精英”在城市中地位的边缘性。

住房虽苦,但这还不是进城精英负担的全部。黄灯讲述了“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

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

知识分子的伪精英处境并不仅限于经济问题,在对社会的影响力上,返乡知识分子们远远低于父老乡亲们的期待。社会阶层的固化让乡村走出的知识分子不能轻易把文化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即便是在自己的老家、自己的村子,也难以改善其家庭的弱势地位。很多作者的家庭都遭遇强权的侵犯,这些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却无能为力。“返乡体”文章很多形式上都承担了“举报”恶势力的功能,如:黄灯“举报”了外人来到村子以度假村的名义圈地,杨仁旺“举报了”别人将亲弟弟打骨折,王磊光“举报”了“墨镜”在外边拿斧头砍人替人讨债,王君柏“举报”了“村委”借修路损公肥私。

四、作为“返乡体”重要成因的阶层固化

通过对返乡知识分子“处境”的分析,可以发现社会阶层流动固化城市和乡村共同面临的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与返乡知识分子的关系更加密

切,他们正是遭遇这一社会问题的核心人群。因此,这个问题也是影响“返乡体”生成和风格的最重要因素。

社会阶层固化笼统地说是阶层间流动性的降低。与本文有关的体现是农家子弟通过知识的积累难以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具体表现方面包括经济收入、政治地位等。社会学家测量阶层固化程度通常可以通过对平民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和通过教育资本的增加实现阶层上升的概率测量获得。很多专家都对此问题有成熟的研究,李煜(2006)基于对1966-2003年间城市青年的高等教育机会之获得数据的研究,试图提出一个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强调教育不平等产生机制、具体制度设计和社会状况背景三者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恢复高考后,家庭教育背景成为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1992年以后社会分化加剧,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显现,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转变为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双重模式并存。吴晓刚(2016;Wu,2010)将研究时段锁定在1990年至2000年的教育扩张过程中,得出了家庭背景对入学的影响作用增加了的结论;吴愈晓(2013)的研究区间为改革开放以来30年,他发现1978-2008年间高等教育扩张的同时,大学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在扩大。总之,三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和时间段论述了家庭背景对子女入学的影响。农村家庭作为社会家庭背景层面的弱势者,自然是这一趋势中难以向上流动并被固化为底层的群体。

另外,即便假设家庭出身较好和出身较差的孩子拥有同样好的教育经历,来自弱势家庭的学子们凭借“知识”积累“改变命运”也越来越难。与二三十年前毕业即成为国家“干部”或进入外资企业享受高收入不同,高校毕业生就业越来越困难,包括硕博研究生们进入社会成为中上阶层的一员、过上体面的生活也越来越难。

2009年廉思主编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实录》出版,“蚁族”成为对“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

群体”的典型概括。廉思认为毕业初期的大学生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2012年,廉思主编的《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出版,编者发现大学青年教师和“蚁族”是同代人,他们才出“蚁穴”,又入“蜂巢”。调查显示,仅有31%的高校青年教师表示自己的收入大于支出,72%的受访者感到压力“非常大”或“比较大”。社会地位本来挺高的大学青年教师近年来被戏称为“青椒”,“屌丝”也是大学毕业生们自嘲时的常用称呼。

2011年,笔者在调查北方滨海某市的城乡问题时也曾听过与此话题相关的反常社会现象——“三本比二本好就业”。通常来讲,第三批本科的录取分数线低于第二批本科,因此“三本”整体生源的质量要比第二批本科差一些,就业竞争力上理应是逊于二本毕业生。但现实情况则不然,“三本”的就业很多都好于“二本”,这个现象在这个近郊城区比较普遍。被访谈人解释,这并非因为“三本”的专业或师资好于“二本”,而是“三本”的学费价格不菲,能负担三本学费的学生通常来自比较富裕的家庭,这些富裕的家庭往往也是更有“社会背景”的家庭。在就业越累越难的今天,“三本”学生的家长更可能凭借掌握的社会资源帮孩子克服学历上的弱势,从而帮孩子找到体面的工作。

总之,相比“返乡体”描述的教育等问题,返乡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劣势地位是更为确凿的困境,也是“返乡体”写作最大的背景之一。正是返乡作者在真实社会中的弱势身份,决定了“返乡体”作者们选择通过批评乡村以维持自尊的路径。同样因为这个背景,“返乡体”可能还承担着春节期间为返乡的知识青年代言的功能。

五、余论

本文主要对“返乡体”的内容结构及生成逻辑进行了分析,重点指出了“返乡体”的问题所在。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返乡体”不是记录乡村现状的好

作品,那如何解释近年来“返乡体”形成的传播盛况?以下几点因素或可作为对此现象的解释。

与其用真实形容“返乡体”,不妨说“返乡体”涉及的话题让公众的参与感更强。农村人和农村出身的学生都是农村问题的利益相关人,农村也是很多定居城市人的乡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社会通常被当作中国的缩影,所以对农的讨论常作为对中国问题讨论的替代。这也就是此话题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农村题材的作品历来容易得到关注,先例不胜枚举,除了前边文提到的鲁迅、陈桂棣夫妇、熊培云和梁鸿等的作品,赵本山影视作品的流行、世纪之交“三农专家”兴起的原因也大抵如此。

与前述作品所处的时代不同,“返乡体”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返乡体”的爆红,凭借的既不是权威平台,不是高质量的内容,也不是公众对内容的普遍认可,而是每个人对话题的参与和经验分享。传统的大众传播结构是以大媒体为平台,以权威角色声音为内容,向广大公众单向传播。2015年,去权威化的媒体生态体系逐渐形成,海量自媒体平台成为发布信息的渠道。手持手机、Pad等移动终端的海量互联网用户与多种媒体随时互动,无数普通用户的朋友圈成为消息传播的中转站。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获取信息快捷且廉价,海量的信息与快速额节奏也导致用户对内容质量更宽容,草根作者因此有更多崭露头角的机会。除了广大公众的参与是促成了“返乡体”爆红网络的原因。“返乡体”文章下的评论留言,以及朋友圈人们的转发附言都证明,对传播的参与并不必基于对文章内容的认同。很多读者对文章的评述是以自己为中心,分享对同类主题的个人经验和意见。

话题受众广泛和媒介形态变迁或许能解释参与者众的现象,但要解释“返乡体”爆红时的爆发力之强还不够充分。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积弊甚多,为此党中央不断提出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和乡村振兴等愿景。“返乡体”固然不是好的农村研究作品,但无论是大众媒体还是学术刊物,能让广大公

众普遍参与的文字作品并不多见。如今知识分子和媒体难以承担正常的社会批评功能,社会各领域的负面情绪长期得不到宣泄,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更不在意“返乡体”的质量和客观性。能有人指出问题,人们能参与讨论,足以促使公众参与并完成“返乡体”爆红这样的奇观。

总之,“返乡体”的爆红是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矛盾积聚和媒体形态变迁等多重因素叠加促成的传播现象。

参考文献

- [1]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6-7.
- [2]段金录,张锡禄.大理历代名碑[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537-538.
- [3]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一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a:123-132.
- [4]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五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b:505.
- [5]高明勇.作为公民,提着笔杆子还乡[EB/OL].http://news.ifeng.com/a/20160216/47455078_0.shtml.
- [6]高胜科.一个东北记者的返乡见闻[EB/OL].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215/09/178233_534698618.shtml.
- [7]黄灯.回馈乡村,何以可能?[J].十月,2016,(1):181-213.
- [8]孔德继.泛滥的返乡体折射知识分子阶层失衡[N].经济观察报,2017-01-23(08).
- [9]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6,(4):97-109.
- [10]李铮,彭卓,马剑.“村妇组团约炮”报道系假新闻村民:委屈死了[EB/OL].<http://news.huaxi100.com/show-166-744560-1.html>.
- [11]廉思.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12]廉思.蚁族Ⅱ——谁的时代[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 [13]廉思.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 [14]梁鸿.中国在梁庄[M].北京: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 [15]梁鸿.出梁庄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 [16]刘清泰.文科博士们,春节回家能不能别装?[EB/OL].http://news.ifeng.com/a/20170205/50650482_0.shtml.
- [17]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18]石人炳.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新特点——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的比较[J].人口研究,2013,37(2):66-72.
- [19]王君柏.失落的乡村:一位大学教授的乡村笔记[EB/OL].<https://wenku.baidu.com/view/e5e0ab594028915f814dc270.html?from=search>.
- [20]王磊光.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EB/OL].<http://news.huaxi100.com/show-166-744560-1.html>.
- [21]王磊光.呼喊在风雨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 [22]王铭铭.悍妇与乡约[J].西北民族研究,2006,(1):152-153.
- [23]Wu, X. Economic transition, school expansion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90-2000.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10. 28(1), 91-108.
- [24]吴晓刚.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J].社会,2016,(3):3-31.
- [25]吴愈晓.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J].中国社会科学,2013,(3):4-21.
- [26]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 [27]晏阳初,赛珍珠.告语人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6.
- [28]杨菊华.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儿童性别比关系研究[J].人口研究,2006,30(3):30-41.
- [29]杨仁旺.一位教师的返乡报告:有些变化甚至令我不寒而栗[N].中国青年报,2016-02-19(12).
- [30]张小马.情欲勃发的乡村[EB/OL].<http://mini.eastday.com/a/160217141147171-2.html>.
- [31]赵旭东.农民公民与意识形态——由20世纪30年代的平民教育所想到的[J].社会科学论坛,1999,(Z2):16-18.
- [32]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8,(3):110-117.

责任编辑:戚务念